

# 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刘永祥 陈其泰

## 学苑论衡

XUE YUAN LUN HENG

### 内容提要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能够传承发展至今，离不开其突出的包容性。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要以动态的视角、发展的眼光，深入探讨其生成与发展、嬗变与调适、淬炼与升华的过程。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能够发展传承至今，是因为其既不断巩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又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对多元文化兼收并蓄。开放包容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一突出特性在历史长河中经历生成与发展、嬗变与调适、淬炼与升华的过程，成为中华民族创造璀璨文明、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所在。我们要以动态的视角、发展的眼光深入研究包容性这一突出特性，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贡献学术智慧。

### 生成与发展

包容性这一突出特性，最早比较鲜明地体现在中华文明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协和万邦”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协和万邦”是基于几千年前邦国林立、分族而居的政治和社会情形提出来的，极其凝练地表达了古圣先贤对处理各邦国和各民族之间复杂关系的基本准则和政治理想。所谓“和”，是用安抚、协调的措施来对待邦国之间的矛盾，而不是采用征服和压服的手段。这就使大小邦国之间能够建立一个和同的社会秩

序，民众得以安定。这一理念在后世的儒家经典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尤其体现在“诸夏”与“夷狄”的判定标准上。

古代中国被称为“诸夏”，周边的民族被统称为“夷狄”。作为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孔子认为“诸夏”和“夷狄”之间存在共同的道德标准，而且“夷狄”也有长处。《论语·八佾》提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过去的注解家把“不如”解释为“比不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成了“夷狄即使有国君，也比不上诸夏没有国君”，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宋代朱熹注释这句话时，将“不如”解释为“不像”，这样整句话道理更显然、逻辑更分明。孔子所著的《春秋》称原先被视为“夷狄”的楚国国君、吴国国君为“楚子”“吴子”，即与上述孔子的理智态度相照应。孔子对所谓“夷狄”的开明态度，深深影响了《春秋公羊传》。《春秋公羊传》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以文明程度来区分夷夏，而不是把种族作为评判标准。同时，《春秋公羊传》还认为，经过长期融合，最终能够彻底消除夷夏之别，达到“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理想境界。

孔子开启的夷夏可变论影响极为深远，不仅被董仲舒、何休等一大批思想家所传承和弘扬，而且成为后世王朝所共同遵循的原则，从而建构起一套极具开放性、灵活性又十分稳固的文明秩序。从中国历史的整体演进看，政治大一统和交流融合毫无疑问占据主流地位，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自秦汉统一局面形成以后，很多君主都强调“四海一家”。汉武帝提出“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隋炀帝称“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唐太宗说“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明太祖在推翻元朝统治后立即昭示天下：“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开放包容、团结和谐，无论文化如何多样、族群如何多元，彼此间总会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最终融为一体。古代典籍中的另一个常用概念“混一天下”同样体现了这一点。中华文明的演进模式是周边共塑中原、中原反哺周边，是多方的互化，而不是单向的同化，这是中西方文明演进的重大差别。

### 嬗变与调适

清朝的建立和巩固，实现了中国空前规模的大一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认同进一步增强。当清朝疆域基本定型时，“夷”和“外”也就有了新的内涵，不再指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而是清朝大一统版

图之外的民族、国家、文化。但是，在19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面临巨大转折。此时，除了要妥善处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应对西方文明的东进。作为清代中后期学术思想主流的公羊学，其进步的夷夏观在延续中华文明包容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不少学者以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形势的认识，发前人所未发，比如，龚自珍反复陈述清代边疆形势与前代大不相同，迫切问题是建立起健全的行政系统，“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魏源在公羊学影响下，冲破了“严夷夏之大防”的思想枷锁，跨过中西文化巨大差异的界限，认识到不能以昔日的“夷狄”视之，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人物；梁启超深谙公羊学进步夷夏观的理论精华，以大义确凿的证据论证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他认为“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我族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怀远之教胜，而排外之习少，故不以固有之民族自域，而欢迎新分子之加入。”

辛亥革命爆发后，国内传统夷夏大防观念复苏，西方列强也假借所谓单种族的民族国家理论，试图让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危机。当时，许多学者撰文批评“排满”等狭隘的种族主义会上中国陷入分裂，认为华夷之别在文化不在种族，而经过几千年交流融合，彼此之间已实现一体化。基于此，“五族大同”“五族共和”“大中华”等概念被提了出来，最终被付诸中华民族的实践中。

在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建构这一重大问题上，中国并未“跟着西方走”，而是遵循自身几千年的文化逻辑，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可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其他文化但又坚守自身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的最好体现。这一突出特性在近代经历了嬗变与调适，在处理内部民族关系和应对西方文明冲击两大层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 淬炼与升华

中华民国的建立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华文明依然处于蒙尘的境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也成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经过淬炼、实现升华，并结合时代条件为解决“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时代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坚定不移地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自觉从几千年历史文化中汲取优秀资源，从而在国家制度、民族关系等方面建构起特色极为鲜明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力证明协和万邦、四海一家等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仍有重要价值。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针对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何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如何促进人类发展与进步等重大问题给出的答案。它们同根同源，一脉相承，都植根于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四海一家、和而不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伟大情怀，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的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又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的旧思维只会让路越走越窄，无法破解人类面临的困局。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表明，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在平等相待、互学互鉴中兼收并蓄、交相辉映。我们要加强对于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的研究，为促进文明多样性和人类永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作者分别为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学术随笔

XUE SHU SUI BI

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历史学的旺盛生命力源于其开放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当前，人工智能在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知识图谱、机器翻译、大数据挖掘等方面的突破与应用，不仅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也为历史学的繁荣发展插上了数字翅膀，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口述史也迎来了人工智能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我们要积极拥抱新技术，用创新的眼光和开放的胸襟去探索人工智能在口述史研究中的具体应用路径，把握好人工智能在采集、整理、保存、分析、传播等环节对口述史研究的赋能作用。

在采集环节，人工智能有望彻底改变传统的访谈模式，实现口述史的智能化。以访谈形式采集、整理与保存口述者的历史记忆，并呈现口述者亲历的历史真实，是口述史研究的重要旨归。随着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情感计算等技术的进步，目前已经开发出一批虚拟访谈助理、对话式助理等人工智能系统。这些人工智能系统以人机对话的方式与受访者互动，根据受访者的特点自动生成个性化访谈提纲，并根据访谈进程实时调整提纲内容和顺序。此外，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沉浸式技术可以让受访者“穿越”回特定的时空情境，身临其境地重温当年的人和事，为口述史采集营造身临其境的氛围，激发受访者更多的记忆和情感共鸣。

在整理环节，人工智能在转录、编目和索引等方面显著提高效率和精度，实现口述史整理的自动化。在口述史研究中，对访谈内容的整理至关重要，无论是文献整理、文字整理还是影音整理，都有着严格的操作规程。随着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等技术的发展，口述史整理全流程的自动化处理日益成为可能。在转录方面，智能语音识别程序可以自动将口述音频转化为文本，并进行智能标点、分段、生成时间戳和说话人标记等处理，大幅提高转录效率，同时也降低了人工转写的成本与错误率。在编目和索引方面，自然语言处理和知识图谱技术通过命名实体识别、关键词提取、主题聚类算法，能够自动识别和提取口述史资料中的主题、关键词、人名、地名、时间等重要信息，按照预定义的规则 and 标准生成元数据，建立资料目录和索引。

在保存环节，人工智能改变口述史的保存方式和管理模式，进而提升其安全系数、管理效率与利用水平。海量口述史资料的数字化保存面临诸多挑战，如存储空间不足、检索效率低下与数据安全隐患等。人工智能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方法。比如，智能化的数据压缩和存储技术可以大幅降低口述史资料的存储成本，区块链技术可以为相关资料提供更加安全可信的存储环境；人工智能可以自动提取口述史资料的语义特征，构建多维度、细粒度的索引，实现智能化检索，从而显著提升其利用效率。人工智能的有效应用使得海量口述史资料长期保存和智能化管理更为便利、可行，从技术层面延续了口述史的生命力。

在分析环节，人工智能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有助于开辟口述史研究的新范式与新路径。传统的口述史研究在分析环节主要依赖研究者的主观解读和历史想象力，着重强调对个体经验的描述和诠释，而人工智能的引入则为口述史分析提供了更多定量分析和数据驱动的研究工具和方法。这些研究工具和方法包括：可以实现口述史资料的智能化解析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能够帮助研究者发现口述史资料中隐性知识和深层关系的知识图谱和语义网络技术，可以帮助研究者从海量口述史资料中发现有价值的模式和趋势的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技术，等等。人工智能不仅是口述史分析的工具和方法，更是口述史研究范式转变和创新的催化剂，将推动口述史研究从传统的人文解释学范式向数据密集型、技术驱动型的新范式转变。

在传播环节，人工智能开辟了一系列新的呈现模式与途径，有助于创造更加大众化、交互化、沉浸化的口述史体验。人工智能与数字人文的结合开辟了口述史传播的新路径、新方式、新格局。比如，智能展示技术可以创新呈现方式，沉浸式现实、虚拟人、体感交互等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打造身临其境的口述史沉浸体验；再如，智能推荐技术可以实现精准传播，人工智能系统可以采集用户的浏览行为、兴趣偏好等数据，利用协同过滤、内容过滤等算法，自动为其推送相匹配的口述史内容，提高传播的精度和转化率；等等。

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人工智能与口述史的融合将会更加深入，促进口述史研究观念、方法、路径与模式等的全方位创新，让口述史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人工智能并非口述史发展的“灵丹妙药”，在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比如，如何确保口述史资料的真实性与代表性，如何避免著作权侵犯、隐私泄露、数据滥用等风险，如何避免算法模型的偏见和误读，如何平衡技术应用与人文关怀，如何应对数字鸿沟带来的不平等，等等。这些都是口述史研究在拥抱人工智能的同时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面向未来，我们既要借助人工智能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也要坚守人文情怀和学术操守，以历史学的管理自觉引领技术应用，实现人机协同、优势互补，拓展研究的智能化实践，打造研究与应用的广阔前景与全新境界。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提高人工智能时代口述史研究水平

杨祥银

##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研究》简评

汪信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袁银传撰著的《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从理论、历史、现实、实践等多个维度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进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该书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论述，研究阐释新

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时代背景、理论前提、基本经验、基本路径、历史意义。该书坚持唯物史观，秉持正确党史观，明确我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对新时代我们党如何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进行分析阐释，探讨了为什么要进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怎样进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原创性贡献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 为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贡献力量

——第四届全国党建高端论坛述要

曾毅

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推动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主办、青海省委党校（青海省行政学院）承办的第四届全国党建高端论坛日前在西宁市召开。与会者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理论渊源、文化底蕴、实践经验、概念范畴、话语体系，这一重要思想为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提供科学指引等展开研讨。

与会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这一重要思想是一个具有很强政治性、科学性、实践性的理论体系，凝结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理论成果和丰富实践经验。广大党建理论工作者要深入把握这一重要思想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打牢思想根基、开展学术研究、做好宣传阐释，为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

## 拓展研究视野 提炼学术命题

# 突出宋明理学的文化研究路径

鹿博

活世界与历史世界的研究范式。比如，束景南先生对朱熹、王阳明的思想及生平做了系统的历史考察和深入研究，实现了对宋明心性哲学研究新的提炼，对理学文化精神内核与当代价值进行深度发掘和创新阐释。二是立足东亚，考察宋明理学对中、日、韩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探讨新时代开展宋明理学跨区域、跨文化研究的方式方法。比如，有学者依据对东亚儒学的整体考察，提出以“广义阳明学”的思路揭示阳明学的区域发展差异和普遍性精神，揭示儒家文化的跨地域影响力。三是结合明清之际中国政治、文化发生的系列变动来考察宋明理学的发展与转向。比如，有学者主张以贯通视野对宋元明清整个时段的思想文化进行研究，探讨了宋明理学与清代思想文化之间的断裂性与连续性；还有学者从理学与地方、理学与家庭、理学与宗教等多元视域考察了明清更迭之际的理学文化的变迁进程。这三种研究范式体现了新的研究方法、路径、视野，它们的共通之处在于都坚持了

宋明理学的文化研究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代、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化宋明理学研究提供了科学遵循。展望未来的宋明理学研究，跳出单一学科探索，突出宋明理学的文化研究路径应是值得重视的方向。我们要借鉴当代文化学研究理论，融会文化学的专业视角和方法，推进宋明理学的文化研究，有效开辟宋明理学研究新的增长空间。具体来看，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在研究视野上，可引入文化社会学、文化心理学、文化符号学等专业理论，细化宋明理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形态的探讨。从更为丰富、深入的文化视角，考察并揭示宋明理学与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具体关系，比如开拓理学与地方建设、理学与科技发展、理学与休闲生活等多领域的研究。二是在研究内容上，坚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立足现实持续从宋明理学提炼学术命题，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建设、文明发展贡献学术力量。比如，可进一步深化对宋明理学中主体性思想与人文主义文化的探讨，大力发掘、深度提炼其所蕴含的世界性议题，展现宋明理学的当代价值。三是在研究方式方法上，既注重通过走出书斋和技术赋能来更新传统文献研究方式，也注重通过开展跨学科研究来创新研究方法。要持续推广田野调查法，引导宋明理学文化研究从书斋走向生活、走进大众，在实践调研的基础上，推进理学文化的社会学研究。要深入推进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赋能理学文化资料的搜辑、整理和研究。比如，可以进一步完善理学文献数据库的兼容功能与更新机制，共享机制的建设，为更翔实、更系统的宋明理学文化研究提供数字资源保障。还应加强跨学科研究。比如，可以采取类型比较法，考察理学文化在不同群体中呈现出来的演化规律，开展宋明理学文化的传播学研究。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